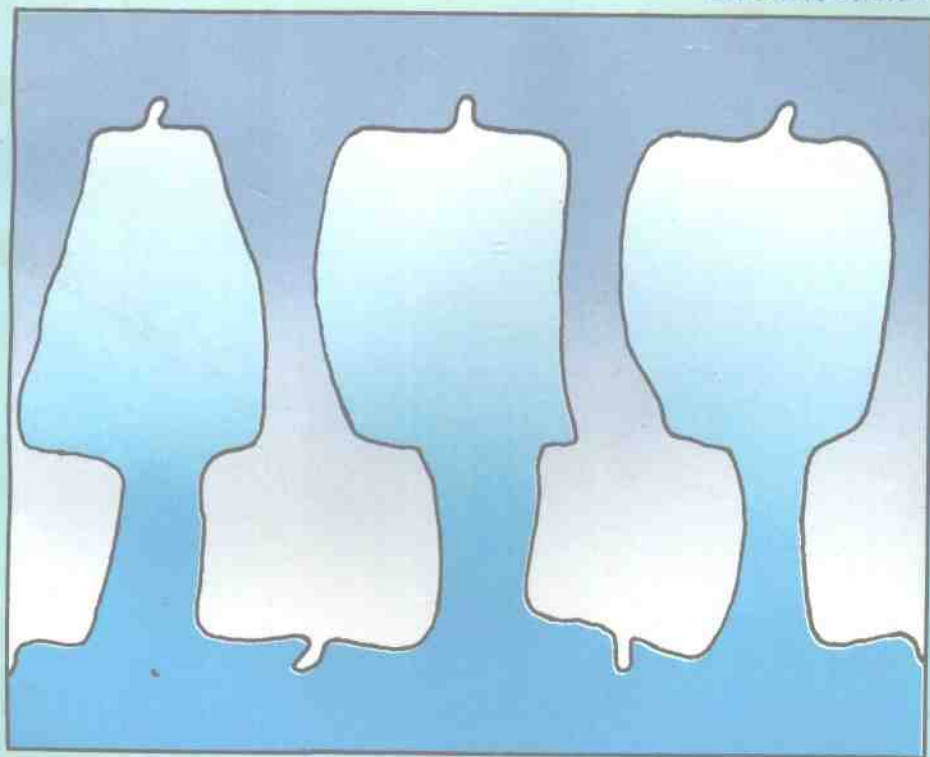


王 宁 著

比较文学 与 中国 当代文学

云南教育出版社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王宁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滇)新登字03号

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BIJIAO WENXUE YU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王 宁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58 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15-0581-1/I·24 定价: 3.05 元

序

新近故去的杨周翰先生经常强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这句话至今对我印象还很深。我想杨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以中国和中国文学为出发点来研究外国文学，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应当是现代中国人的结论，而与外国人的结论有所不同。这样，我们就能开拓一个文学研究的新角度、新局面，也有可能对外国文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如果我们只是沿着外国人走过的老路来研究外国文学，我们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很难有所创新和超越。记得杨先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的一次讲演中，谈到莎士比亚戏剧对死亡的处理时，就完全是根据中国人的传统生死观和自然观进行阐述的。这次讲演在该校英文系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很多学者认为杨先生的看法激发了他们新的思考。

同样，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也应该不同于古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当今时代，我们完全有条件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发展的宏观格局和脉络中，以外国文学为参照系来审视自己，亦即将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这样的研究才有可能超越前人，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作过这样的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

民族的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恩的预言体现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还说过：“自然科学将来会统括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也会统摄自然科学，二者将来会成为一种科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更是预言，将会出现“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更为强大的潮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各学科门类是朝向精细和分解发展，那么21世纪的大趋势则是朝向综合和整一。系统论所提出的“整体性悖论”强调：系统的整体功能并不等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的总和，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它具有各个组成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因此必须把事物作为某一系统的要素来研究^①。这已经成为当代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指导原则。文学研究也不能只限于文学本身，而必须在与其他人思维表达方式，如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广泛联系中来考察。这就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比较文学正是以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综合为主要内容，因此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的产物。

本书作者王宁同志作为杨周翰先生精心指导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博士，对中西文学和文论有着精深的研究，他相当全面地体现了杨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在这本篇幅不大的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努力联系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来研究外国文艺思潮和作品的，如《西方文艺思潮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也

^① 参见贝特朗非：《普遍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科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努力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广阔语境中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如《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折》、《我看中国文学中的“弗洛伊德热”》，以及《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就是这方面的力作，他的《阐释与变体——中国当代三部小说的精神分析式阅读》更是用西方文艺思想阐释中国文学现象的一个成功范例；至于跨学科研究，更是王宁同志一向重视并付出了不少精力予以钻研的。如本书第一篇就曾作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导论而引起过反响。总之，这本论文集可以说画龙点睛地反映了我国比较文学10年来发展的主要方面，体现了杨周翰先生一再强调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作品文本的实际出发，不作理论空谈的治学精神，它无疑会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促进和助益。

乐黛云

1990年9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1……序

乐黛云

1……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

18……走向“对话”的时代

——90年代比较文学展望

24……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 & 未来走向

30……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4……西方文艺思潮与新时期中国文学

74……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

106……我看中国文学中的“弗洛伊德热”

114……阐释与变体

——中国当代三部小说的精神分析式阅读

132……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折

——兼论学院派批评

142……批评的困惑与顿悟

149……驰骋在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下

——评杨周翰的比较文学观

162……外国文学研究的全新角度

——读《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172……比较——研究——应用

——谈乐黛云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180附录一：关于文学史、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诸问题

——访著名学者佛克马教授

187附录二：从“欧洲中心”到真正的东西方对话

——第13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述评

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

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于19世纪后半期诞生并有所长足发展的话，那么，它迄今已步履维艰地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有人说，它已成了一门日趋成熟的独立学科，其标志是它已深入到教学课堂和文学研究界，各种类型的论文、专著汗牛充栋；也有人则根本否定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应有的存在价值，其理由是它至今也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因此距离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应具备的条件还相差甚远。本文并无意对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发表意见，只想根据目前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模式，以打破长久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两根支柱”支撑的局面。至于这种方法能否有效地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我此时还不敢妄加推测。但至少我本人对这种方法的研究前景是抱乐观态度的。

在1987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2届年会（西安）上，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

D·W·佛克马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其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再也没有什么“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说，学者们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应当积极介入当前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老是纠缠于学派之争只能导致新的危机。因此，本文可以说正是朝着这个努力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何谓“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加速了人们的思维空间的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已不再能满足宏观综合研究的需要，因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并且超越文学自身界限的综合比较研究，已经为当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1975年，在一次国际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Jean-Pierre Baricelli）第一次提出，研究比较文学不应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poly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他所谓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只是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因此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打破了学科界限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没有突破这一既定的模式，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在他提出这种研究方法之后，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到新理论、新方法的挑战和冲击。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在西方也确实日渐增多，特别是它有助于研究者摆脱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孤立研究文学本身之束缚，把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跨文化和多学科背景下来俯视，来考

察。应该承认，这种方法的提出，不仅使日益陷入危机的比较文学摆脱了窘境，而且对一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视野的开拓，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和“理论热”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本文提出的超学科研究究竟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巴利塞里的模式呢？它的内涵和外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它具体又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我认为，所谓超学科比较研究除了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外，它还必须具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两极效应。一极是“以文学为中心”（韦勒克语），立足于文学这个“本”，由此渗透到各个层次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次回归到“本体”，求得外延了的本体。另一极则平等对待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揭示文学与它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阶段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最后，在两极效应的总合中求取“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文学，经过了一个循环之后又回归到文学本体来，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本体复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本体超越，得出的结论大大超越原来的出发点，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实际上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熔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类比研究等各种方法于一炉，达到多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综合比较之层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方法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学研究，它不屑于对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现象、文学范畴、审美符号、创作规律、创作活动、创作心理、读者阅读、接受心理、批评鉴赏等问题泛泛而谈，而是通过多方面的比较，立足于文学本身的角度，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高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

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学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既是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超越和深化，同时又不同于韦勒克所谓的“文学的外部研究”那样的平行比较模式。

文学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对于这样的问题可有多种回答，这不仅是因为各人回答的角度不同或人们对文化本身的界定不甚明确，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的内容十分复杂，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明确，因此眼下要对文化作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探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般认为，文化包括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时，文化又涉及具体的习俗、制度及各种观念形态，因此文化是一个大的开放的系统，而文学则只是这个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自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种文学观点、一场文学运动或一个文学流派的生成、发展乃至衰亡，总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气候和土壤，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不同民族的文学，自然有着各种差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更是不言自明。即使是同属于一个文化背景的欧洲文学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也表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别或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例如风靡全欧洲的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显示出了在全欧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英国达到了全盛阶段，在法国则姗姗来迟，而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用几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正是：德国出思想，法国出宣言，英国出作品。这也许是德国人重玄学、法

国人重观念、英国人重想象的传统所致吧。这也说明，一种文化或文学思潮在异域的传播，除了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文化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指明了20世纪各门类艺术的总的倾向”，波及到几乎整个欧美国家，同时也波及到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但其波及的程度却不尽相同：“……在有些国家，现代主义似乎对于文学和艺术传统的演变有着重要意义；而在另一些国家，现代主义似乎仅光顾了一下就扬长而去了。”^①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更是一个“包容性的”泛文化现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必然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对这样的现象作出分析，自然也不能脱离文化的因素。因此，把文学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来比较，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使之不受某种固定模式的局限。

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何以做到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呢？首先，我们要看到，“文学作品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简而言之，审美因素是那些受到审美需要，以及作为形式结构或‘虚构’工作或无目的‘制作’的支配性决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那些显然受到写特定作品的具体个人的创作所决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则主要是由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写出某一部作品的状况所决定的特征。当然，前两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文化条件的，而且彼此间也密切相关”^②。因此，从文化角度来探讨文学可分为这样三个步骤：（1）文学的文化阅读，即把文学作品当

①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伦：《现代主义：1890年到1930年》（*Modernism: 1890—1930*），企鹅丛书1978年版，第23页。

② 转引自M·布拉德伯里和D·帕尔马：《当代批评》（*Contemporary Criticism*），伦敦，1970年版，第161页。

作为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发掘出隐含在语言符号中的文化意义。（2）文学的文化批评，即把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来考察，突破文学的本文因素，把批评的层次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把批评的背景扩展到大文化系统的各个方面，给人以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3）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它包括历时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平行研究，也包括共时的文学的文化关联性和文化参照系，即不仅考虑到文学内部的文化因子，而且还要探讨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文学生产、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制约的作用。总之，“文学——文化分析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用任何其他方式作出解释之前，就强调了一个文化的表达因素，强调了表达性‘阅读’的重要性”^①。毫无疑问，在20世纪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受到挫折后，弘扬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它可以弥补传统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不足，同时又是对形式主义的有力反拨和超越。

文学与社会科学

如果说，文学创作属于广义的艺术创作范围、更带有感性和情感色彩的话，那么研究创作思想、创作规律、创作流派，进而对文学创作进行理性的、思辨的和科学的分析研究的文学学就理所应当地从属于社会科学^②，因此研究超学科比较文学，注意力还应放在探讨文学或文学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关系上。

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一般规律的总结，作为

① 转引自《当代批评》，第163页。

② 但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文学研究通常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以区别它与历史、哲学、经济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不同。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起着某种指导和制约作用。哲学和文学在阐述一种思想时分别依循不同的方法：哲学是思辨的、逻辑的、推理的，因而具有抽象的理论色彩；而文学则是艺术的、审美的，因而是具体的和形象化的。当然，文学创作有时也可以是非理性的或无意识的。谈到哲学的理性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发难。但一般说来，哲学思维重理性，文学思维则重感性；哲学意在揭示出一般规律，而文学则注重张扬个人的创造性才能。那么，怎样才能将这二者糅合在一起考察呢？我认为，文学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活生生的典型材料，文学理论的一些观点经过哲学家的提炼，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批评方法论；而哲学对文学和文学学的影响则是各方面的：（1）它常常被作家图解于自己的作品中。例如，当我们翻开20世纪初一些西方作家的作品，我们就会时常发现一个金发碧眼的人物——尼采式的“超人”——驰骋在文学的空间；同样，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中，尼采之所以被接受则是因为他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作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我们如果再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作品，又会感到这样的超人曾几何时已不见了踪影，出现了另一些倍感失落、异化、疏离、并且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这里被图解了！（2）在思想史上，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往往率先对固有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给予冲击，以致促进以那种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某个文学运动或文学流派的形成。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就一度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基督教存在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分别充当了现代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关于“后现代”问题的哲学论争也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成形。（3）在前面所举的尼采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哲学家本人的文

艺观点也可以对文学的内容以及人物的形象产生影响。如果说，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只是在外部的影响文学，那么萨特的创作则既从外部、又从内部对文学产生了直接的作用，他颇为精当地运用了文学这一“意义的载体”，阐发甚至形象地图解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4）哲学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上。纵观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现状及其走向，其中就有着一一种哲学阐释学的取向：沿着这条线索而来的有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美国批评界的实践则发展为读者反应批评。此外，以德里达为首的后结构主义的发难，也是首先从哲学入手，试图动摇结构主义的基础，摧毁结构主义的各种“中心”，他的分解主义理论近20年来在美国批评界的一度风行就证明了这种哲学的文学批评可能性。

对文学内容发生影响或与文学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还有历史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等等。文学中反映历史事件已有着漫长的历史，古希腊文论家对文学与历史的差别也早有论述，所谓“历史小说”、“历史剧”等文学体裁的出现就说明了历史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不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呼吁，文学批评要有历史感，最近还风行所谓“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这说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在经历了形式主义传统的挑战之后又出现了“回归历史”的趋向，但这种回归仍是经历了一系列“批评的循环”之后外延了的回归。此外，“……具有讽刺的意义的是，历史学家也常常运用文学的方法，但并不把它称为文学方法，而文学家也用同样未定名的方式来运用历史方法”^①。当然，文学和历史的暗合之处还在于“叙述”上：按照当今的流行看法，历史仅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并不包括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历史的叙述才是我们通常从书本上读

^① 转引自《当代批评》，第116页。

到的历史事件的文字记载。因此，要求历史小说、纪实文学达到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本身就是因人而异的。^①社会学虽然还处在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但是文学与社会本身却有着由来已久的关系，因此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包括对这两个学科的综合平行考察，还应当考察文学与社会本身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明显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其价值似乎正在于作者获得了某种活力，这种活力显现出来而且可以直接用文学方式进行讨论……但是一般都认为，这种活力有着一种大于文学范畴的起源，并且存在于作家与现实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当中”^②。因此，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考察包括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作家的社会地位，作品的社会内容、社会功用及社会影响，文学思潮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某种社会思潮通过文学作品的媒介而对读者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社会学和文学批评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作为20世纪以前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之一，文学的社会学批评有着很大的声势。进入20世纪以来，面临着各种形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挑战，社会学批评依然方兴未艾，它具体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萨特的“干预文学”批评等学派中。此外，女权主义批评也带有强烈的政治—社会色彩。当然，过分注重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容易导致文学批评中的“大而空”和“庸俗社会学”倾向，但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归为“外部研究”也是不妥的。美学和宗教学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在于：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文学艺术，美学的理论层次应高于一般的文学理论，具有更为普遍规律性的艺术哲学高度，它能对人生及各门艺

① 参阅杨周翰：《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镜子和七巧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9页。

②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年—1950年》（*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企鹅丛书1979年版，第268页。